

再论冯友兰的大学理念： “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

高秀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中原文化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冯友兰先生的一生大约有7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大学度过的,可以说大学几乎成了冯先生整个人生的舞台,他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上演了一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生活剧。具有世界眼光的冯先生对于大学的理解可谓是独到而高远,他所提出的“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等大学理念,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思想,而且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大学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中图分类号:C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11)04-0112-04

冯友兰先生自1915年秋进入北京大学求学至1990年底在北京大学去世,整整75年,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也就是说大学几乎是冯先生整个人生的舞台,他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上演了一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生活剧。因此,晚年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大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冯先生讲这三所大学,不仅仅是回忆自己在这三所大学里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更重要的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理念及高等教育制度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并为未来中国大学的建设提供借鉴。冯友兰先生长期担任大学的中层领导,经常出席校务会议和教授会,甚至还做过代理校长的职务,所以他对于大学的认识可以说是既深刻又全面。因此,全面考察冯先生关于大学的论述,阐明他的“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等大学理念,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一、大学的本质:“为学术而学术”

关于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冯友兰先生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大学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的学术机构。1925年冯友兰先生在河南中州大学任职期间,在《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一文中,就明确地把“中国现在须力求学术上的独立”作为中国要办大学的目标。^{[1](页30)}冯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总结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虽然日益强

大,但是没做到真正知识学术自主独立的地位”,指出中国要强大起来,真正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就必须抓住机会,确立知识学术独立自主的百年大计,把中国现有的大学办成“大大学”。因为冯先生看到,在世界强国中,每一个强国都有几个“大大学”。大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是研究机构;既是知识宝库,又是智囊团;既是学术中心,又代表着一国学术的最高水准。因此,要办好“大大学”,既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又需要提倡许多冷门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2](页456-459)}

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当冯友兰先生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以自己亲历清华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讲出了“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的话,并将“融合中西新旧”作为“清华的学术传统”。他主张:不管未来风云如何变幻,清华人都应当自觉地“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都应当“重视爱护”这个传统。因为他坚信:“这个传统对于中国的新文化,一定是有大贡献的”。^{[1](页157)}

立足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大学是什么呢?或者说,大学的性质是什么呢?冯友兰先生在《论大学教育》一文中指出,从大学的功用看:她既是教育机关,又是研究机关,是传授已有知识和求新知识的“一个知识的宝库”。^{[1](页160)}他反对把大学看成是“职业学校”“宣传机关”,更反对把大学看成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即大学不属于行政机构,更不是官僚衙门。在他看来,大学里“任何一种学问,只有研究

收稿日期:2011-02-28

作者简介:高秀昌(1962—),男,河南邓州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那一学问的人有发言权,别人实在说来不能对专门知识发言,因为他没有资格”,另外,大学里的专家,“他们研究的业绩的好坏,只有他们的同行可以了解,可以批评,别人不能干涉”,因此说,大学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自行继续”的学术团体、专家集团。^{[1](页161-162)}这里的“自行”,冯先生解释道:“所谓‘自行’就是大学内部的新陈代谢,应该有它自己决定、支配,也就是有它自己谈论、批评。别人不能管。”^{[1](页161)}所以,国家应该给教授、专家教学与研究的自由。^{[1](页161)}

新中国成立初期,冯先生有两篇文章从学风角度论述了大学“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他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一文中,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建立为界划分三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为第一个阶段。其教育的目的即训练做“士”,求得“功名”,在皇帝“架前为臣”,“封妻荫子”,“裕后光前”,即求升官发财。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为第二个阶段。其在学术教育方面建立了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学术是学校的主体,而学术的价值就在于发现真理,即求学术真理。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三个阶段。其教育及学术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即求公利。冯先生进一步指出: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而学习研究,是有所为而为的;“为学术而学术”是无所为而为的;以“为人民服务”而学习研究是“有所为而为”与“无所为而为”的辩证的统一。尽管如此,冯友兰先生还是指出:第三个阶段的“以求‘为人民服务’为目的而研究学术,与以求‘为自己做官’而研究学术,其动机虽然有高下之殊,但从纯学术的观点看,这些都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功利主义对于学术的发展是一种阻碍,无论其动机是为私的或是为公的”。^{[1](页180)}由此看来,冯友兰先生还是倾向于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大学的根本目标,尽管他也根据辩证法似乎肯定了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的教育及学术为最高。

冯友兰先生《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的文章认为:五四运动前后,很多人都主张学术独立。^{[1](页189)}他特别引用陈独秀的观点:“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价值也,而音乐家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学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

(1918年7月15日《学术独立》,载《独秀文存》卷二)在冯先生看来,“五四”以后,“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譬如严复、蔡元培、陈独秀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冯先生的内心还是要坚守“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的,只不过为了迎合时代的需要,企图依据所谓辩证的观点,把“为学术而学术”降格为低于“为人民服务”的被否定的地位。这一方面说明冯先生在放弃自己求真的学术理想,另一方面也表明其独立的人格精神已经被扭曲。

就在冯友兰先生去世的前一年,他在《怀念梅贻琦先生——致梅贻琦铜像揭幕典礼》一文中,特别指出梅贻琦校长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作为执行校长,维持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学术走向独立的一个典范,为中国学术实现独立自主、并为中华民族中兴作出了重大贡献。^{[1](页222)}

在冯先生看来,中国的大学有一个独特的任务,那就是反对“为做官而学术”,倡导“为学术而学术”。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求学问,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当官发财。在冯先生看来,新型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反对过去那种“为做官而学术”,应当像蔡元培校长那样,办大学,做学问,求学问,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踏踏实实地为真理而学问,为学术而学术。冯先生晚年说:“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3](页274)}他强调大学的“为学术而学术”是大学的立校之本,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大学就立不起来,更不要说办好大学了。这可以说是抓住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大学应以自己真正的学术而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冯先生晚年才旗帜鲜明地说:“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3](页279)}

二、大学的治理:“教授治校”

冯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适逢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教授治校”是蔡先生当时所推行的一项制度,即校长之下,有一个管理学校一般事务的总务长,一个管理教学科研的教务长。按规定,教务长由教授民主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教务长不是上级直接任命的,而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这是冯先生所着重强调的,也是大学自由与民主精神的体现。冯先生晚年说:他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也知道蔡元培校长推行的“教授治校”,但是还不很了解它究竟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清华大学当教授了,才真

正了解了“教授治校”的精神。

据冯友兰先生晚年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授治校”在清华大学具有了比较完整的形式。清华大学的评议会由行政当局和教授会的代表组成。当时的文、法、理、工各院的院长由教授会推举二位教授为候选人,由校长选聘其中一人,任期二年,可以连任。“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四个院长组成校务会议,处理学校的经常事务。四个院长也出席评议会,为当然评议员。这样,就有了三级的会议。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好像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因为这三级会议还各有自己的职权,各有自己的名义。校务会议不能用评议会的名义办事,评议会也不能用教授会的名义办事。”^{[3](页279)}这种“教授治校”制度突出了教授的主人翁地位,突出了专家治校的原则,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被证明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和管理形式,因此,冯先生不厌其烦地详细地介绍。

笔者认为,尽管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是一种比较好的管理形式,而且体现了民主治校的精神,但是,它也有缺陷,即大学校长的选拔在教授会之外,是教授会所无法控制和左右的。也就是说,校长不是由本校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直接任命的,这是“教授治校”的重大缺陷。比较完善的形式应当是:不仅各院院长而且校长也应当由本校的教授会选举产生。这是确立大学独立性的基础和关键。

大学作为特殊的学术团体组织,其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学生,同时为探求真理而做学术研究。教授是学校的专家,居于学校的高层。冯先生非常欣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治校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冯先生发挥道:“有了大师,它就是大学;没有大师,就不成其为大学。”^{[3](页279)}使代表学术权威的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成为管理学校的重要部门,这是符合大学的性质和特点的,大学的管理必须走“自治”的道路。如果大学的师生不能自我治理,而要由官僚衙门来越俎代庖地、瞎指挥地进行治理,那么大学也就不成其为大学了,而是成为政府的一级官僚衙门了。如果大学衙门化了,大学就会失去它的相对独立、自主与自由,那大学的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大学的理想:“学术自由”

大学的独立也体现在它的“学术自由”上。金耀基先生曾概述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说:“自古以来,

大学求独立自由,经过无数的奋斗与努力,它们向教会争自由,向皇室争自由,向一切世俗的权势争自由。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可说是一部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4]中国从19世纪末创建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开始,也在争取着自己的独立而自由民主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争取自由民主的精神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真正的知识分子追求大学自由民主的理想。受德国大学理念的启发和五四启蒙精神的激励,蔡元培先生就倡导“大学研究学理”的理念,并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他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门大学,哲学之唯物论与唯心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①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倡导并践行着“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与主张,使得北京大学成为现代中国大学的理想典范而为后人所称颂。冯先生晚年回忆说:那时的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个“自由王国”。在那里,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研究所得,自由地教书,“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至于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直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就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3](页276)}这只是从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些细节方面,说明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在践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时所出现的自由新气象,足见“学术自由”在推动大学发展时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在抗日战争那个特殊的年代,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形式上松散,但因为各自的“教授治校”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即使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依然能维持正规教育、发扬“五四”传统。这里所说的“五四”传统即“五四”的自由、民主精神传统。

冯友兰先生对于当时人们称颂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颇为自豪,并且极力宣扬这种自由、民主精神。他晚年回忆说:“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了。一九三九年就要求院长以上的教职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

^①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党部,称为区党部,在各学院设立区分部。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学生中还公开设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3](页295)}显然,冯先生是明确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校”的,他所希望的是继续坚持树立教授会的权威,继续推行“教授治校”“专家治校”的制度。可以想见,冯友兰先生及其同仁在那样非常的条件下,利用教授会维护大学的学术独立与自由方面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因此,冯先生在其所作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就总结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3](页301)}可以看出,冯先生对自由、民主精神的礼赞,正是为了维护他所倡导的大学的根本精神——学术自由与治理民主的精神。

大学之所以追求学术自由,主要是因为大学是教授、专家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场所。在这里,学术上的问题,只有教授和专家学者有发言权。冯先生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中,就“大大学”的独立、自主、自由作了系统的阐发:“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的专家有发言权。大大学之内,每一部分的专家,怎样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不必使别人了解,也没有法子使别人了解。在他们的同行当中,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坏,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批评。每一个大大学都应该是一个所谓‘自行继续’底团体。这就说一个大大学的内部底新陈代谢都应该由他自己来处理。由他自己淘汰他的旧分子,由他自己吸收他的新分子,外边底人,不能干涉。若要干涉,那就是所谓‘教玉人雕琢玉’了。”^{[2](页459)}这里,他不仅把国家的强大跟“大大学”紧密相连,而且把“大大学”的独立、自主、自由与学术独立紧密相连。冯先生晚年还说:“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是

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问题……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3](页272)}不唯官,不唯上,只唯学。

事实上,大学独立与学术独立是二而一的关系:大学不能独立,则学术不能独立,反之亦然。进一步说,大学与学术不能独立,也就没有大学与学术的自由;反过来说也一样,没有大学与学术的自由,也就没有大学与学术的独立。冯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想倡导“教授治校”“专家治校”,而这些正是“大大学”的根本。

笔者认为,冯先生一生所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等大学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笔者着重强调的是:大学必须摆脱现行的官僚行政架构,否则,中国的大学将没有出路。这就是说,大学必须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自由性,尤其是要坚持学术独立,制度民主。仅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为例:在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的大学一直是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中国大学大到校长任命、经费划拨、学生的招收与分配,小到教学计划的制订以及老师和学生的管理,都是由主管部门说了算。大学的机构设置、科层结构、行政级别与政府机关几乎是一个样子,运行模式与政府机关也几乎是一个样子。因此,官僚化、行政化成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言而喻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也几乎成了千人一面、不分你我的“衙府”,其严重的恶果至今仍然在发酵中,阻碍着中国大学前进的步伐。完全可以相信这样的观点:如果中国大学的官僚体制不变,那么大学所存在的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不但永远得不到解决,甚至还会产生许多新的更难解决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先生所倡导的大学理念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建设新大学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4]金耀基.大学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2.

(下转第121页)

总之,高等教育资助对象认定工作是一项复杂烦琐的工作,只有做好资助对象的认定工作才能有效地分配资助资金,确保资助资源的合理利用,更好地解决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 [2] 王善迈.论高等教育的学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
- [3] 罗朴尚,宋映泉,魏建国.中国现行学生资助政策评估[J/OL]http://ciefr.pku.edu.cn/html/2010-11/1271.html.
- [4] 王远伟,高巍.经济因素对个人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

[J].教育学报,2007,(4).

[5] 袁连生.美国大学生资助需求公式及对中国的启示[J].教育与经济,2007,(3).

[6]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 刘建平.贫困线测定方法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4).

[8] 祝梅娟.贫困线测算方法的最优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03,(6).

[9] 徐明宇,傅梅.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的新问题及解决途径[J].文教资料,2008,(6).

[10] 李桂兰.关于高校贫困生认定问题的思考[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2008,(2).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Beneficiaries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HE Bao-yue^{1,2}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Abstract: It is true that higher education is a quasi-public good; but the public properties vary among different levels and types of universities and between different specialties. Individual choices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private good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current enrollment system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what best reflects the private-good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level of selection indexes on different specialties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which could be obtained and verified by the density of applications for one specialty or university and the matriculation marks. In order to do well in provid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first of all, a classification of applicants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selection index of the applicant's university and specialty, based on which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or the university may be designated a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provide the assistance. Secondly, a poverty ranking index of the poverty-stricken students should be set up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their monthly expenditures, the type of their specialty, the location of their families, the payment of their tuitions,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that can reflect the degree of poverty of them. Thirdly, other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to make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transparent and accurate, to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cost for dishonest applicants, to promote market-oriented subsidies, and to improve relevant policies and details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financial assistance; classification; ranking;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李玉恒]

(上接第115页)

Feng Youlan's Idea of University Revisited:

“Academic Research for Academic Purposes”, “Rule by Professors”, and “Academic Freedom”

GAO Xiu-cha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Central Plains Culture,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Mr. Feng Youlan had spent over 70 years on university campuses in his lifetime. To some extent, we can say that university campuses had become Mr. Feng's life stage where he studied, worked and lived. Therefore, Mr. Feng had had an in-depth and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and essence of a university. The ideas of “academic research for academic purposes”, “rule by professors”, “academic freedom”, among others, proposed by him not only inherited and extended Mr. Cai Yuanpei's educational ideologies, but also are of significant value of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the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 the present age.

Key words: idea of university; “academic research for academic purposes”; “rule by professors”; “academic freedom”

[责任编辑:李玉恒]